

电波传号令 决胜千里外

■曹明敏 程宇一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我军英勇顽强、坚决斗争,面对人数、装备均占优的敌人,经历了战略防御、反攻、决战和追歼,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等,基本消灭国民党军主力。作战过程中,兵力规模大、行动节奏快、战役间隙短,党中央、毛主席通过无线电通信始终保持对前方战役兵团顺畅指挥,最终取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



平津战役前夕,通信人员检查通信器材。

灵活应变巧用兵

1947年3月,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山东及陕甘宁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美国援助下,国民党军利用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设备,对我军电台进行不间断的侦测,以判断我指挥机关位置与行踪。3月10日晚,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在洛川前线指挥部召集军、师、旅长开会,具体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利用无线电测向仪探测我军电台位置。进攻延安的相关情报被我隐蔽战线人员获取,第一时间便通过西安秘密电台发往延安。收到这份情报后,党中央下令无线电静默3天,避敌锋芒。3月19日,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同时,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胜利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期间,我军通信兵利用有限通信器材与用装备美式电讯设备的胡宗南部展开激烈周旋与对抗,机动灵活地完成了各项作战部署和指挥通信任务。

我军还利用敌人迷信电台测向的心理,将计就计迷惑敌人。不久,在孟良崮战役中,我军使用一部隐藏在坦埠以北山谷中的电台实施无线电伴动,频繁发送虚假报文进行通信联络,伪装成华东野战军总部电台迷惑敌人,而远在鲁南

隐蔽的华北野战军第6纵队电台,坚持以收听为主,少发报或不发报,确保部队隐蔽性,混淆敌人判断。对侦测盲目自信的敌人中计后,第6纵队立即隐蔽急行军,对坦埠实施包围攻势,切断整编第74师后路,为夺取孟良崮战役胜利奠定基础。

10月,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正在子洲县马蹄沟村开会,敌侦测到马蹄沟一带电波信号强,由此判断我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随即派飞机突袭轰炸。面对指挥机关屡遭敌机轰炸的情况,党中央决定用电台伪装、无线电静默等方式灵活制敌。1948年,在攻克宜川城战斗中,我军暂停使用无线电通信部署,各部队采用传统通信联络方式接收任务,敌人无法摸清我军情况和兵力部署,误认为我军主力正在围攻宜川城,剩余兵力无法阻挡其支援宜川。当胡宗南援军进入包围圈后,我军无线电台全部打开,指挥员立即通过电台指挥执行提前部署好的“宜川打援”战斗计划,经过近30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援敌,攻克宜川城。

决胜千里党指挥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中国革命的决胜阶段,毛泽东在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屋里阅读前线电报,亲自起草电报和文

件,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滴答、滴答”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在辽沈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在电报中反复探讨如何在东北战场取胜。针对敌人据守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以保持到关内通道的企图,毛泽东决心先打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前后多次发电报指示林彪攻打锦州,全歼东北之敌。10月,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第9兵团廖耀湘部向沈阳突围。根据已破译的敌军电报,毛泽东掌握敌战略动向、军事行动,甚至对敌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充增援和装备编制都了如指掌,通过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迅速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回师,歼灭廖耀湘兵团后,又立即向沈阳、营口进击。据统计,毛泽东在西柏坡亲笔书写和口述的电报达408封,阅读前线电报上千份。仅在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就向前线发出77封电报,指挥人民军队夺取胜利。

1948年10月31日,淮海战役发起前,粟裕致电请示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后一致表示同意,毛泽东亲自起草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从组织上明确了淮海战役统一领导问题。6日,

毛泽东电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次日,粟裕执笔“齐辰电”请示中央军委,并得到回复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

高效协同打胜仗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以8个纵队牵制李弥兵团,7个纵队在徐州以东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通过电报实时掌握战场态势,在徐西和徐蚌地区积极作战牵制迷惑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分割歼敌,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华东野战军以7个纵队在徐南阻击徐州之敌,调5个纵队南下,及时攻占宿县,切断徐埠线,完成对徐州战略包围后,又阻击包围黄维兵团。蒋介石急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由徐州南下,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由蚌埠北上,企图解救黄维兵团。面对发生重大变化的战场形势,粟裕一边以7纵、11纵加入进攻,一边致电请示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先歼灭黄维兵团,后歼灭杜聿明集团。毛泽东立即通过电报指示,“中野、华野并肩作战,华野阻击增援之敌,中野全歼黄维兵团。”1月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全歼邱、李兵团,俘虏杜聿明,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

1948年10月底,中央军委就酝酿采用“围而不打”战法,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实行战略包围和分割。当时华北战场守敌傅作义集团共有60余万人,受到辽沈、淮海两大战役震慑,华北敌军企图逃窜。为稳住敌军,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起草了多封发给林彪、聂荣臻等的电报,要求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至少以8个纵队提前入关,迅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断敌南逃之路,同时电示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部署在张家口、新保安附近平绥线上,堵住敌人西逃之路。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80万人和华北野战军20万人,在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完全将敌人分割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5个孤立据点内。周恩来后来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④

微历史

迫击炮的发展

迫击炮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342年。阿拉伯人用短角筒装入黑火药和铁球,点燃后射向敌人。这种原始火炮可视为现代迫击炮的雏形。

第一门迫击炮诞生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将老式的海军臼炮改装,通过大仰角发射长尾形炮弹杀伤日军。这种在战场上应急诞生的火炮,被称为“雷击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在“雷击炮”的基础上,研制出多种专用迫击炮。1927年,法国研制的带有缓冲器的81mm迫击炮,已基本具备现代迫击炮的特点。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迫击炮具有射速高、威力大、携带方便、操作简单等优势,成为步兵的基本装备。

如今,迫击炮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仍不可小觑,其主要发展为后装性线膛模式、曲平射两用模式和自动连发模式,大口径的迫击炮也逐渐趋向自行火炮化。

“回天”无力的鱼雷

回天鱼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特攻作战中使用的自杀式武器。“回天”的命名寄托着日军逆转战局的愿望。

回天鱼雷直径1米,鱼雷内部可装载乘员1名,乘员可由小型潜望镜确认敌舰的位置和操纵鱼雷,以增加对敌舰的命中率,其所装载的炸药量比一般鱼雷多3倍。早期型的回天鱼雷设有乘员逃逸系统,但没有记录显示有乘员在鱼雷发射后逃生成功;后期的回天鱼雷干脆取消了乘员逃逸系统,一旦鱼雷攻击失败,乘员可以通过自毁装置将鱼雷手动炸掉。

据统计,日军大约制造回天鱼雷400枚,但实际使用的仅有100多枚,战果寥寥。日本开发这种武器可谓得不偿失,反倒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进程。(杨正刚、刘泽华)

民国时期,位于北平前门大栅栏的东升平是城里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高级浴室”,常有达官显贵进进出出。鲜为人知的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曾在此建立“情报站”,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杨梅竹斜街近景,当年东升平浴室就位于这条街附近。

东升平里的“情报站”

■郑大壮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北平,也加紧了对中共党员和地下党组织的搜捕和破坏。当时,中共北平市委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和开展情报联络工作。北平市委下设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由苏一夫、万一和赵凡等人领导,负责在北平城内的洗浴、理发和餐饮等商业和服务业场所开展工作。

一番细致考察后,平委认为东升平浴室位于闹市,浴室名气很大,往来的顾客中包括不少资本家、政府要员以及国民党特务,地下党员在此隐蔽工作,能够获得各路消息。浴室里的100多名工人、小伙子都处在社会最底层,长期受资本家压榨,生活窘迫,反抗情绪高涨,非常适合我党发展群众,建立“情报站”。

据史料记载,东升平的创始人仿照上海浴室的建造风格,其在北平浴池业的设备和条件是最好的,人气最旺,价格也最高。浴室共有三层,三楼是单

间客房。地下党员时常扮成有钱人或国民政府官员,和那些社会上流人士“打交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平委,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赵凡,当时掩护的身份是一名布匹商人。在赵凡的回忆录《忆征程》里,详细描述了他和其他地下工作者在东升平接头的情形,“我们伪装成有钱的人来洗澡,利用这里特殊安全的地方研究工作、交流情况,我们来这里一般都是在(三楼的)4号或者6号房间。”

平委常在东升平浴室开碰头会,他们在这里获得的情报,由交通员及时送到北平西部的斋堂,再通过电台发出。当时传递情报,主要依靠自行车。一次,交通员在往门头沟传递情报时,遇到敌人检查,自行车被没收,而情报就藏在自行车的车把里。敌人仔细检查后,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把自行车还了回来,而情报依然完好地保存在车把里。

当时,处在北平城内闹市区的东升平浴室,迎来送往的都是些达官贵人,

敌人对这里的戒备较松。一次,国民党警察局一位姓安的官员把枪交到工人李福海手中,并说,到了别处我不放心,在你们这儿安全,这枪交给你保存。那时,国民党正在北平全城搜捕共产党,他却不知道自己把枪亲手交到共产党员的手中。

经过不懈努力,到北平解放前夕,平委在东升平共建立了2个地下党支部,发展了18名党员。

由于叛徒出卖,平委的赵凡同志于1948年底被捕入狱,东升平的地下党支部也面临着危机。值得庆幸的是,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赵凡也顺利获释。

1949年10月,东升平浴室停业,后在原址改造为东升平宾馆。历经多次整修,这栋建筑仍依稀留存着当年的风貌。

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

军事地理研究是我国古典兵学的重要内容,注重考察地理环境对战略攻防态势、战役容量、兵力部署以及战争进程的影响。明末,军事家和学者的深入研究使得军事地理学发展到了高峰期,系统论述军事地理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也于此时诞生。

前期铺垫

自先秦时期开始,军事地理学便成为古典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子兵法》将“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13篇兵法中,既有专门结合地形讨论战术思想的《地形篇》,也有论述作战环境和兵要地理的《九地篇》。此外,《六韬》《孙臧兵法》等兵书也充分结合地形研究战术。

研究军事地理,既需精通军事理论,也需钻研军事历史,须不辞辛劳地亲历险关隘等“兵家必争之地”,熟悉各种复杂地理环境。因此,军事地理学是一门实践之学,与明朝一度风靡的心学大不相同。明末,尤其是万历之后的学风悄然发生转变,正如学者所言“从空谈性理转入经世务实”,学风的转变促成了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进一步兴起。

明朝学者王士性遍游全国,著成《五岳游草》《广游志》等地理学巨作,关注人文地理的同时,也论及军事地理。《筹海图编》等书深入讨论海洋地理,注意结合海岸地形条件,探讨海防战略,总结海战战法。大型兵书《武备志》中也有许多讨论军事地理的内容,作者茅元仪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明代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等情况,提出了边防、海防、江防并重的战略思想,这既体现了当时的军事需要,也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军事资料。其中“战略考”一章从战略高度考察地理条件,分析天下兴亡。

渐入佳境

王士性著书《广志绎》,标志着明末的军事地理研究渐入佳境。该书通过对古代战争史上的军事行动战场研究,分析各处险要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探讨“天下山河之象”。例如,在论述山西东胜、偏关、宁武几处要塞的重要性时,作者指出,以往的种种防守战术之所以不得要领、屡遭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三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在王士性看来,这3处要塞需互相配合、彼此相依,才能构筑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

顾炎武也是军事地理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的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山东肇域记》《历代宅京记》等,几乎都将重点放在地理学,并大量涉及军事地理。《天下郡国利病书》尤其侧重于辑录经济地理及军事得失等方面内容,对各地的物产、赋役、水利、漕运、屯田、边防、关隘等,均有详细记录。《历代宅京记》则试图从地理中探讨朝代更替和兴亡得失之理,从中可以窥见其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思想体系和著述理想。著述《历代宅京记》时,顾炎武曾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考察顾炎武的著述和治学,其中也贯穿了这一思想。

全祖望总结和评价顾炎武时曾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每到险要之地,顾炎武便与老兵一起探讨当地地理,又与旧籍仔细进行对照核实。这种严谨细致的地理学研究,包含了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抱负,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军事色彩。清代学者认为,顾炎武“最明于地理之学”,对军事地理学的发展有

明末军事地理学的发展

■熊剑平 徐寅

很大贡献。

名作撷英

明末对军事地理学用力最大且成就最高的学者,要数顾祖禹。他的代表作《读史方舆纪要》,积20余年辛苦著成,共130卷,约280万字,被视为古代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沿革地理的必备参考书。梁启超曾称赞此书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非常看重其价值。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曾重点研读过此书,革命战争中的运筹帷幄与他军事地理的熟悉不无关系。

顾祖禹对孙子的军事地理思想非常推崇,称“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所以下足功夫专门研究军事地理。《读史方舆纪要》中贯穿经世致用思想,在山川险要之中探讨古今兴亡的道理以及进退、攻守的方法得失等,以阐明“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的道理。

出于对军事方面的强调,顾祖禹在书中着重记述历代兴亡、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进而从中推导出地理与战争胜负的内在联系。无论是论述地理还是记载历史,始终突出军事色彩,强调军事与地理的结合。记述山川地理形势时,大量引述历史上的战例,总结地理形势的得失,希望人们能够记住古往今来的用兵得失,更好地利用各种地理形势。结合孙子的军事地理思想,顾祖禹提出了“地利变化无穷”和“争地必得其人”的主张。

对于《读史方舆纪要》,清末张之洞有这样的评语:“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并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顾祖禹辩证地看待人与地的关系,在他看来,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终究是人,而非地理条件。天险固然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北,为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地势险要,被誉为“中华第一关”。与宁武关、偏关合称“外三关”。2001年,雁门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图为在原址重建的雁门关关城。